

■世界历史

16 至 18 世纪西欧东扩论

薛 国 中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薛国中(1929-), 男, 湖北巴东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 15—16 世纪世界史研究。

[摘 要] “地理大发现”后, 从 16 世纪开始世界市场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 欧亚大西洋—印度洋新航路的开通, 扩大了东西方的物资和金融交流, 从而促进欧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大西洋—印度洋航线; 东印度公司; 香料贸易

[中图分类号] K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5-0700-09

16 世纪, 西欧走出本土向外洋扩张。首先向海外扩张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伊比利亚半岛并非经济发达的先进地区, 却为其北方经济发展的国家鸣锣开道, 立下不朽的汗马功劳。

西葡两国的海外扩张, 从 15 世纪末, 甚至从 15 世纪前期就开始了。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探险队, 1492 年发现美洲。葡萄牙的外洋探险从 15 世纪中叶开始沿着西非大西洋海岸南下, 1498 年绕过非洲到达印度。17 世纪西北欧的国家才踏着先行者的足迹跟进。有西方学者评论这东西两路探险活动说: “16 世纪欧洲发展的第一个长期阶段, 首先根植于美洲的冒险, 其次才是东方的冒险。”^[1] (P. 63) 把美洲冒险定位为首要和根本的方面, 此番评论未必恰当。西欧向外洋扩张之始, 并不知道其西方有个美洲, 他们受 13 世纪《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影响, 久已向往东方的亚洲, 认为那里才是富庶的天堂, 梦想到那里去大发横财, 所以, 哥伦布的西航, 明确的目的是要达到东方的印度; 意外地到达美洲后, 也还没有放弃继续西航寻求亚洲的希望^[2] (第 140 页), 此其一。其二, 继西葡之后向外扩张的荷兰和英国, 都是先着重于东方, 后经营西方, 两国最先组织开发海外的公司是“东印度公司”, 积极于东方的活动并获得巨额利润, 促进着本国经济的发展。所以,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 欧洲人在东印度比在西印度得到的“金融成就”更大^[3] (P. 142); “对欧洲来说, 东方贸易是非常有利的事。”^[4] (P. 55) 既然如此, 何能言欧洲扩张“首先根植于美洲的冒险”。故此, 本文首重于西欧的东扩。当然也不能忽视开发美洲所获金银对亚洲贸易的支持, 诚如 E. J. 汉密尔顿所言: “哥伦布的航海是对达·伽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补充。”^[2] (第 134 页)

西欧外洋扩张的动因

西欧在 11—14 世纪上半叶, 社会经济曾有过迅速的发展, 以地中海区域为例, “1000—1350 年, 人口增加了 4 倍”, “生产按人头计, 增加了 1 倍多, 商贸增加了 10 倍”^[1] (P. 262-263)。14 世纪下半叶遭到历时半个世纪的大灾患, 即黑死病广泛流行, 人口锐减了 1/2—2/3 (各地情况不等), 大片大片农田荒废, 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15 世纪中叶以后, 各受灾地区开始不同程度的复苏, 15 世纪中期欧洲人口约 6 700 万^[5] (P. 162), 接近大瘟疫前的 7 500 万^[6] (第 38 页)。荒废的土地再度耕垦, 工业尤其毛纺织工业得到新的发展, 商业随之活跃起来。西欧三面环海, 各国多以海洋为依托, 有天生面向

海洋的倾向,重视海外贸易;但15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未越出欧洲的范围。

西欧在黑死病之后又逐渐繁荣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十分令人困惑的问题:货币严重不足。地中海贸易区,货币荒从来没有比1350—1500年这一长的时期更为严重^[1](P.263)。欧洲自古以来就以贵金属(金银)为货币的基础,贵金属矿藏多分布于欧洲中东部,即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巴尔干半岛。12、13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热火朝天地开采冶炼,“千辛万苦地设法弄到贵金属,以满足其经济中对金属货币不断增加的需求”^[1](P.103),捷克的波希米亚在14世纪前后,向欧洲提供了40%的白银。黑死病流行期间被迫中止,其后继续开采冶炼。西方学者估计,“1460年至1530年间,白银产量在中欧增加了4倍,但仍供不应求”^[7](第31页)。欧洲贵金属矿的蕴藏量本来有限,不仅白银黄金产量都不多。据估计,1500年欧洲白银总存储量为37 500吨,黄金大约为3 500吨^[8](第450页)。这为数并不多的贵金属,在地中海区域与东方的香料及奢侈品贸易中,还要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不断地支付给阿拉伯商人,更使得欧洲的货币形势雪上加霜。在以白银为货币基础的地区,不得不降低货币的含银量。例如在15世纪普鲁士与波兰的“30年战争”期间(1454—1466),普鲁士货币的含银量下降了1/4,物价上涨,人民不满,议会不断抱怨说:“银币贬值,毁坏了我们的国家。”^[9](P.67)。1350—1500年长期感到黄金十分短缺,“昔日惯于使用黄金的基督教地区的经济,在14、15世纪没有黄金就不能维持下去”^[1](P.265)。黄金在伊比利亚半岛完全消失。

欧洲的黄金储存量不及白银的1/10。为了缓解经济生活中黄金不足的危机,地中海贸易区的商人,以欧洲生产的纺织品、比较粗糙的金属制品(如铜器)以及一部分白银,从非洲马格里布地区(Maghrib,指地中海南岸北非从摩洛哥到利比亚地区)换取黄金。非洲的黄金产于苏丹,是用原始淘金术提取的沙金(gold dust),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从黑人手里换取后,用骆驼运输,越过撒哈拉大沙漠,到达马格里布诸港口,转售与欧洲商人。苏丹的黄金产量也不高,生产方法落后,有人估计一年不超过4吨^[1](P.99)。尽管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这里是当时欧洲获得黄金的重要来源,自然受到欧洲人、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官商平民的重视。16世纪以前,地中海区域的经济就是建立在非洲经马格里布所取得的黄金基础之上。欧洲人当然不会满足这一有限的黄金来源,希望能在非洲找到更多的黄金产地,以便更多的直接获取,这就成为西欧向海外扩张的重要动因之一。

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第二个重要动因,是对香料的需求,这是因为欧洲人口增涨、饮食结构的变化,以及15世纪上半叶地中海以东政治形势改变所引起的。欧洲人自古就有好肉食的习俗。黑死病之后由于人口大幅减少,劳动力缺乏且工价昂贵,种植谷物投入多而获利微,养羊所需人力少而获利厚。于是大片农田改为牧场和草场,养羊业得到迅速大规模地发展。随着饲养业发展而来的是肉食品的增加,15世纪欧洲人饮食菜单显示,各地肉类消费量大幅度上升^[1](P.298)。随着肉食品的增加,与此密切相关的香料消费也要相应增加。“一位历史学家说,在地理大发现前,欧洲约消费10 000公担胡椒,和10 000公担其他香料。”^[10](第434页)香料是个总称,包括胡椒、丁香、肉桂、豆蔻等等物品,其中主要是胡椒。在肉食品中,香料有两种功能:一是排除牛羊肉和鱼肉的膻腥气味,二是据说能保持肉类不腐臭。欧洲不产任何香料,所用香料从9世纪起就来自亚洲的印度、锡兰和东南亚地区,历来都是阿拉伯商人先由船运越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再用大篷车运到地中海东岸所谓利凡特区各港口和黑海之滨,分别售与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威尼斯商人经营香料的大部分,15世纪上半叶,每年有20只左右的海船到利凡特区与阿拉伯商人交易。有人估计,这些船只运输来自亚洲的货物总共不到45 000吨,其中只有一部分是香料^[5](P.394),其它还有染料、药材、丝绸等物。这是一条主要的商业路线。热那亚商人所经营的北部商路,将从阿拉伯商人手中收购的亚洲商品,由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之伊斯坦布尔)起运,出爱琴海送到欧洲各地,其数量更小。东方香料贸易无论是对阿拉伯商人还是意大利商人,都是一项大发横财的贸易,“一公斤胡椒在印度产地值1—2克白银,在亚历山大港的价格达10—14克,在威尼斯达14—18克,在欧洲各消费国则达20—30克”^[10](第435页),这意味着欧洲的消费者要用高出产地10—15甚至20—30倍的价格购买。欧洲人口不断增涨和肉食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以上两条水陆兼程数量有限的香料供应路线,自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要付出巨额白银,包括胡椒在内的2万公担

香料,“要用 65 000 公斤白银换取”^[10](第 435 页)。更有甚者,15 世纪中期以后,地中海东部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大帝国,占领了西亚、北非和东欧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地区,阻断了东西商路。热那亚商人经营香料的机运完全丧失,虽还有威尼斯商人还能坚持,但通过埃及输入欧洲的香料也大大减少。欧洲人既然花了高昂的代价尚不能得到足够的香料,不得不另谋来路。

早在 13 世纪中叶,欧洲人就熟知有一种来自非洲叫 *malaguetta* 的胡椒,可作为胡椒的代用品,产于西非,商人运到北非地中海海岸城市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 今属利比亚),意大利商人收购散售于欧洲各地。这种非洲胡椒的质量远不如亚洲的胡椒,故被称为“假货”,有钱的贵族不愿使用,然价格低廉,颇受一般平民欢迎。于是这种“假货”在欧洲的消费量日增,从 1470 年以后,从非洲输入到欧洲的数量逐年攀升,从 1493 至 1519 年 26 年内,输入欧洲的非洲胡椒达 16 689 公担^[11](P.299),尽管非洲胡椒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欧洲对东方香料需求之不足,但欧洲商人并不就此止步,而是认为如果找到非洲胡椒的产地,直接组织收购,数量会更大,价格会更便宜,且运输路程较近,又无障碍,必然会获得更大的利润。于是,寻找非洲胡椒产地,成为欧洲人向海外扩张的另一重要动因。

西欧的扩张还有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动因,情况复杂,本文不拟涉及,而无可置疑的是,经济动因是最主要的,西方学者差不多都肯定这一点。扩张的第一阶段目标只是非洲。有学者认为,直到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亲王于 1460 年去世时,“向非洲的航行尚与亚洲无关”^[11](P.63)。另有学者则认为,亨利亲王“最初开始他的行动计划时,并未想到印度,但是随着他的船队沿非洲海岸越来越往前驶去,他的视界自然会从非洲的商队贸易扩大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2](第 127 页)。两种说法略有不同,但都认为西欧对外扩张的最初目标,既不是亚洲,更不是美洲。当时葡萄牙人虽只试图直接向非洲索取财源来解决他们的社会经济问题,但这是开辟大西洋—印度洋新航路之非常重要的步骤,没有大西洋西非沿岸的探险,也就没有 16 世纪越过印度洋的航行。随着非洲探险事业的进展,要建立一条新的通向亚洲的航线以取代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商人控制的商路的历史课题,自然提到欧洲人的日程表上。把大西洋的探险与印度洋的探险连接起来,作为海洋探险的新目标,使西欧的对外扩张进入第二个阶段。

欧亚新航路开拓者葡萄牙

西欧扩张可以葡萄牙大西洋探险为起点,从 1415 年占领摩洛哥的休达,到 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历时大半个世纪,才开通西欧经大西洋、印度洋到达东方的新航路,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沿西非海岸南下的探险。葡萄牙是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的一个小国,虽不曾受到 14 世纪下半叶黑死病的袭击,社会经济未遭到破坏,但严重缺乏铸造货币的黄金和食粮。从 1384 年至 1434 年一直存在着货币危机,平均每三年有一年缺粮,黄金和谷物都依赖从摩洛哥输入。除此之外,还要从马格里布地区进口非洲胡椒。这些经济生活中的不足,是使葡萄牙向外扩张的重要原因。葡萄牙之所以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先行者,有其特殊条件,第一,地理位置优越。葡萄牙位于北纬 42°—35°之间,有利的海流恰巧在这里汇合,便于向外洋航行;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且曲折成锯齿状,便于船舶出海和回港;紧近非洲和非洲外洋的群岛,便于向非洲及大西洋诸海岛探险。第二,本国有良好的政治形势。当时的西欧处于动荡之中,英法正陷于百年战争(1337—1453),其后不久英国又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玫瑰战争(1455—1485),西班牙和意大利也苦于国内不安。只有葡萄牙政局稳定,国内平静无事,有精力来从容地进行海外探险活动。第三,有进行海外活动的资本。葡萄牙的外洋探险是由其阿维斯(Avis)王朝领导的,受到本国商人和侨居该国的热那亚商人的支持。热那亚商人在葡萄牙有大量投资,王朝政府进行外洋探险可以从热那亚人那里按照需要如数得到资助,热那亚人为对抗其竞争对手威尼斯人也乐于大力鼓励葡萄牙进行对外扩张。第四,有相当的航海经验和航海技术。早在 14 世纪,葡萄牙的海员和商人就开始沿着大西洋海岸北行,伸入到英国和佛兰德斯地区的港口,积累了一定的远程航海的经验,同时又吸收了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的航海技术,如指南针、航海图及海水测量等等。

葡萄牙的海军在亨利亲王的指挥下,于 1415 年 5 月渡海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休达。休达是

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摩洛哥王国在地中海与大西洋交汇处的主要港口城市,位置十分重要,是进入非洲的口岸。休达是个古老城市,古代称埃西利亚(Essilia)、塞普塔(Septa)或塞普体姆(Septem),阿拉伯人占据后改称塞布塔(Sebtan),葡萄牙人占领后才改名休达^[1](P.109)。摩洛哥王国于1418年和1419年两度试图夺回这座城市,均未成功。葡萄牙人夺取和固守这座城市,是要以此为基地,以便很好地控制从苏丹运来的黄金和从西非运来的胡椒,进而由此向南,沿西非海岸进行探险。

占领休达可视为葡萄牙征服西非的开始,然后逐步缓慢地向南推进。1420年和1432年相继发现非洲外洋的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继续南行,1432年到达西撒哈拉的博哈多角(Bojodor Cape),打开了撒哈拉沙漠的海岸。绕过博哈多角,到达塞内加尔,在塞内加尔河口建立其在西非海岸的第一个港口。1445年占据佛得角半岛。继续前进,经塞拉利昂、加纳,越过几内亚湾,于1475年到达刚果。加纳的圣乔治·迪尔·米纳(St George del Mina)是非洲的黄金口岸,1500—1521年平均每年输出黄金410公斤^[1](P.297),故称“黄金海岸”,葡萄牙人控制了 this 最富庶的黄金贸易中心。至此,葡萄牙在西非海岸的商业性探险,进行了半个世纪,获得相当大的利益,据估计,1485—1520年间,每年从西非运回首都里斯本的黄金在半吨以上^[8](第451页),还有胡椒、象牙、棉花、糖和数以千计的黑人奴隶。在贝宁取得的胡椒,于1486年第一次在里斯本出售。“从贝宁输入的胡椒量虽只有从印度输入的1/12,却是亚洲丁香或肉豆蔻的10倍或12倍。”^[1](P.299)

葡萄牙海洋探险到达刚果后,国王若奥二世(John II, 1481—1495在位)认为,“非洲总有个尽头,如果这样,那么他的船只迟早会进入印度洋”^[11](第96页),于是派出由三条小船编成的船队,在迪亚士率领下于1487年底或1488年初(具体时间难以确定)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由于船员们反对继续航进,该船队返回葡萄牙。1497年7月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1496—1521在位)派遣达·伽马率船队沿着迪亚士开辟的航道继续东行,次年5月到达印度西部香料输出港口卡利卡特,从西欧到亚洲的新航路终于开通。达·伽马在印度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国,于1499年回到里斯本,“这船货物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费用的60倍”^[2](第133页)。如此巨大的利润,一方面向世人昭示这条新航路的价值,另一方面加强了葡萄牙王国要垄断新航路沿线贸易的决心,他们不仅要把其他欧洲人排除在外,还要把数百年来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阿拉伯商人和其它东方民族排除在外。

1500年,国王曼努埃尔派出由佩德罗·阿尔瓦雷·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率领一个13艘船只的船队去印度,1501年又派遣由达·伽马指挥的一支20艘船的船队去印度,尽管途中有严重损失,“但每一次都带回了大量的香料”^[11](第124—125页)。1509年,国王任命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为葡萄牙印度事务总督。阿尔布克尔克于1510年率领23艘兵舰攻克印度西海岸的重镇果阿,以此为基地,收集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尔(Malabar)地区的香料。1511年又侵占了马来西亚的重要港口马六甲,打开印度洋通向东南亚的大门,控制着东南亚各类商品(主要是香料)西运的咽喉。葡萄牙在印度洋区域内的攻势,1510—1515年达到了高潮,建立起以果阿为首府的东方殖民帝国,使印度一些小国家成为其卫星国。它控制着红海的出入口亚丁,控制着波斯湾的出口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成功地截断了穆斯林从印度到利凡特的香料路线,迫使他们关闭了一直设在地中海各港口的代理机构”^[12](P.409)。葡萄牙每年有20只船从亚洲运回香料、瓷器、纺织品等物,使威尼斯所经营的东方贸易大受打击。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威尼斯商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平均每年可获得350万英镑的香料,而在1502—1505年的4年中急剧减少,平均每年仅获得100英镑。与此相反,葡萄牙人由新航路进口的香料,从1501年的22.4万英镑,到1503—1506年平均每年上升230英镑^[2](第37页),几乎垄断了亚欧的全部香料贸易,1504年威尼斯大帆船在亚历山大和贝鲁特一袋香料也买不到。葡萄牙在荷兰的安特卫普设立经销店。西方学者们描述道:“1501年第一艘葡萄牙船在安特卫普卸下了胡椒。1503年葡萄牙便开始定期往安特卫普运货。”“在1512至1513年间,维也纳的商人团体曾因来自威尼斯的香料供应不足而向皇帝抱怨,并要求从安特卫普……订购所需的香料。”^[8](第411页)“英国人在安特卫普购买到葡萄牙人运来的香料,德国南方的商人以前是在传统的威尼斯市场上购买,如今则在安特卫普购买,卡斯蒂尼亚(Castile,即西班牙)与法国也立即购买葡萄牙人贩运的香料,就是热那亚和威尼斯自己

也是这样。”^[12](P.409)据统计,“在 16 世纪,(欧洲)总需求量大约为 300 万至 400 万磅”^[8](第 409 页)。整个欧洲贪婪地注视着源源流入葡萄牙的香料。比较而言,“大西洋”胡椒运输成本要低得多。

葡萄牙霸踞印度洋并占领马六甲之后,进一步再向东扩展,把触角伸到了中国,于 1557 年取得了在澳门居住与通商的权利,从此以后以澳门为基地,西与印度、欧洲进行远程贸易,东与菲律宾、台湾以及日本进行转口贸易。他们在澳门装载从广州收购的丝织品、生丝和瓷器运销于长崎以换取日本的白银,运销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以换取西班牙人从美洲运来的白银,再将这些白银在澳门换取中国的黄金输送到欧洲,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又向中国推销印度及东南亚的香料及珍奇物品。因此有人说:“葡萄牙是第一个世界贸易者”^[13](P.193),“是近代世界(殖民)帝国的第一个创建者”^[11](第 148 页)。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西非的黄金,加上亚洲的胡椒和香料,实际上到 1506 年已构成葡萄牙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此后,随着亚洲贸易比重不断增长,它就组成了‘帝国经济的基础’”^[7](第 418-419 页)。但为时仅半个世纪,这个东方殖民帝国就逐渐衰落,其对亚洲香料贸易的垄断被打破。

葡萄牙失去东方香料贸易的垄断,主要是因为:第一,自身经济力量不足,不能生产出使东方民族感兴趣的货物,也没有足够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换取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掠夺的贵金属,只能拿一些零碎的小物件进行交换,这些东西不适合亚洲市场,且质量差价格高,例如,葡萄牙制造的衬衫,价格等于印度衬衫的 10 倍^[2](第 134 页)。第二,葡萄牙在东方的香料贸易是由王室控制的,王国政府派出去管理香料贸易的官吏贪污腐败,收受阿拉伯商人的贿赂,让他们的船只驶入红海和波斯湾,继续从旧的商路进行香料贸易,1515—1527 年法国里昂市场的香料,一半以上来自旧商路^[8](第 412 页),至 16 世纪中叶,每年通过利凡特区的香料贸易,已恢复到 1500 年以前的景况^[12](P.410)。16 世纪 60 年代后期,输入欧洲的胡椒,一半是利凡特商路运去的。第三,从西欧到亚洲的大西洋—印度洋航线,是一条漫长的航运线,经过好望角时,常遇到剧烈的气候变化。葡萄牙人运输香料时,却将货物装入口袋中置于漏水的船舱。香料浸水受潮变质,损失很大,运到欧洲后,剩余的香料不得不高价出售,比由印度洋经波斯湾、红海至地中海东岸水陆兼程所运的香料,便宜不了多少,葡萄牙人自己贬损了新航路的价值。17 世纪荷兰和英国进入亚洲后,经济与海军实力都不足的葡萄牙在竞争中必然败北,丧失其垄断地位。

葡萄牙对东方香料贸易的垄断是短期的,仅半个世纪,而为促进东西方经济交流所作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开辟了大西洋—印度洋的欧亚新航线。与地中海—印度洋旧商路比较,新商路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一,旧商路先海运从印度洋经红海和波斯湾至北非和西亚后,须再用装载量十分有限的大篷车运至地中海和黑海港口,运输成本高,且运输量受到限制。新航线全程用大海船运输,装载量大,增加东西方物资和金融交流量,有助于欧亚社会经济更快发展。其二,新航路运输线虽长,但航程单一,无须水陆交接的中途转运环节,省去多次货物装卸的费用及减少货物的损失,有利于降低商品成本和价格。在葡萄牙控制这条新航线期间,英国曾多次企图从欧洲东北和西北方向寻求另一条去亚洲的航路,都是徒劳无功,最后还是循着葡萄牙的踪迹到达东方,这更证明了葡萄牙所开辟新航线的历史价值。

以距今 500 多年的航海条件开辟出这条新航道是非常不容易的,葡萄牙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许多船只沉没海底,许多人员死于海外。美国学者查·爱·诺埃尔写道,葡萄牙“到东方去的每一只船都须很大的费用配置船员和装备。船只损耗很快,每只船去印度几个来回就不能用了。此外,伤亡率很高,因船只经常失事,每次失事意味着一大笔投资沉入大西洋或印度洋海底”^[11](第 154 页)。巨大的代价换取了长途远洋航行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如何绕过风急浪恶的好望角(迪亚士称为“风暴角”)这段艰险航程的经验,对后继者东航大有价值。例如,曾随葡萄牙东航的荷兰人简·哈伊吉恩·冯·林索登,于 1595 年发表的《旅行日记》,“为取道绕过好望角的航线提供了航行指导”^[2](第 166 页)。另一个曾随葡萄牙东航的英国人斯蒂芬斯,也发表了他这次航行的报导^[4](P.65)。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派船去印度,是由一个曾在葡萄牙舰船上工作过并熟悉好望角风向和水流的英国人导航。这些都表明葡萄牙开辟新航道的经验,对后继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荷英东印度公司

西欧东扩,继葡萄牙之后,荷兰和英国相继崛起。为了争夺印度和东南亚的资源,两国都建立了专门经营亚洲贸易的组织,均名“东印度公司”。半个世纪后,法国也成立东印度公司,插手印度的贸易,因受英国的排斥,无多大作为,不在本文的视线之内。迄17世纪荷英两国在西欧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东扩时国内资本主义在成长,他们伸入到亚洲和美洲,标志着资本主义从此走向全世界。

荷兰又称尼德兰,国土虽然狭小,资源不足,但能尽量利用外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制造业,所需的羊毛、谷物、大麻、亚麻、沥青、树脂、铁等等,均来自海外。羊毛主要从西班牙和英国进口,织造出精美的高级呢绒运销“世界各地”。1562—1567年,荷兰输出的呢绒,平均每年35 500匹,1661—1783年,平均每年为50 000匹^[12](P.439)。从北欧输入木材、沥青、焦油、制造船缆的大麻和制造风帆的亚麻,建造成成本低廉适用的海船,借以发展自己的航运事业。其造船业高度机械化,几乎能一天生产一艘。其商船队在1600年就拥有船舶10 000艘^[2](第168页),欧洲无有与之伦比者,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从北欧输入的谷物酿造出啤酒,销于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3](P.170)。当时有人夸张地说,荷兰不种植亚麻,但织造出比世界其他国家都要多的麻布;他们不饲养羊群,然而织造出无数的衣料;他们完全不培育森林,但在造船和修建堤坝所用的木材,比任何国家都多^[12](P.431)。

16世纪后期,荷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年科内利乌斯·德·豪特曼(Cornalius de Houtman)受命率领一支船队,沿着葡萄牙开辟的航线去印度^[12](P.447),这可能是试探性的。接着于1598—1599年,由雅各布·范·尼克(Jacob Van Neck)指挥的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之摩鹿加群岛(今印尼马鲁古群岛),染指香料贸易,获得40%的利润。于是,荷兰人纷纷涌入东方海域,从1598年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1艘武装船只到达东方^[13](P.196)。当时,东南亚已分别为葡萄牙和西班牙所控制(西班牙于1565年从美洲而来占领了菲律宾),荷兰人意识到,要与西葡争夺东南亚的资源,必须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和雄厚的资本。于是,荷兰工商业者于1602年在国会的支持下组织起来,以阿姆斯特丹为主,联合其它城市,建立了“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The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of the Netherlands,简称“东印度公司”),资本50万英镑^[12](P.448)。国会授予该公司特许状,赋予诸多特权:有对从好望角越印度洋、太平洋至南美南端麦哲伦海峡(或合恩角)一线的贸易垄断权;有开战、议和、建立殖民地、夺取海上外国船只、建立城堡及铸造货币等权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带着巨大的资本,持着国家赋予的种种权力,加上其强大的海上航运力量,向称霸亚洲的葡萄牙东方殖民帝国挑战。有人统计,1602—1610年,东印度公司驶往亚洲的船只共计60只^[12](P.448)。又有人统计,17世纪头一二十年内,从欧洲开到东印度的船只共250艘,其中荷兰占了半数^[3](P.131)。其后还不断增加,1626—1670年则增为平均每年22艘,1671—1750年又增为平均每年29艘^[14](第359页);而在此以前的1670年,来往于荷兰与东印度间船只曾达到100艘,其中多数载重量600吨^[13](P.196)。这样强大的海上势力,对葡萄牙有压倒的优势。

荷兰进入亚洲后,受到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欢迎,与之建立联盟,共同反对葡萄牙的统治。在穆斯林的帮助下,荷兰在印度西东沿海建立了若干贸易站,从这些商站输出印度所产的生丝、纺织品、硝石、大米甚至鸦片^[14](第60页)。1636—1645年,荷兰封锁果阿是时达9年,大大限制了葡萄牙在印度的活动。1658年,荷兰夺取了葡萄牙在锡兰的殖民地,1663年夺取了印度南端西海岸的柯钦(Cochin)。这样,荷兰就占有了印度洋区域内大部分的贸易。在印度洋以东,荷兰绕过尚为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直航到爪哇岛,使马六甲失去旧日的重要性。1619年,荷兰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总部,作为经营亚欧贸易的中枢,并借以对付葡萄牙的果阿和马六甲,任命简·皮特佐恩·柯恩为总督(Jan Pieterszoon Coen,任职时间为1618—1629年)。与葡萄牙的总督阿尔布克尔克一样,柯恩也是个颇具开拓能力的人物,他知道东南亚(西方称东印度群岛)是香料的主要产区,便大力开发和经营这个区域的香料贸易,把葡萄牙人从这个地区赶走。1621年,荷兰占领了班达群岛(印尼东部班达海中),1641年把葡萄牙赶出

了马六甲,1647 年吞并了安汶岛(马古鲁群岛之一),控制了丁香的生产,还企图夺取菲律宾,遭西班牙抵御未果。总之,在 17 世纪上半叶,几乎完全控制了菲律宾以西整个印度洋区域的贸易,迫使葡萄牙退居于中国澳门一隅。尽管在区域内,中国人、马来人、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与之竞争,荷兰占据优势。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经营东南亚的同时,还把势力推进到东北亚区域,1624—1662 年占据中国的台湾,取代了葡萄牙对台湾的贸易,阻断葡萄牙对日本的商业。1638—1654 年在日本长崎设立商务机构,将中国的生丝从台湾运销日本,换得白银,1640 年贩运中国生丝至日本的船只有 85 艘之多^[3](P.136)。还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运销东南亚,换取各种香料。至此,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从亚洲经好望角(1652 年在此建立了一块殖民地)到欧洲的远程贸易,而且还控制了亚洲范围的转口贸易。通过这些贸易,荷兰获得巨额利润,仅 1605—1612 年内,东印度公司的红利达到 37.5%^[11](第 449 页)。从 1715 年开始的 6 年内,平均利率为 40%^[12](第 143 页)。其间,在班达岛与安沃岛的香料贸易中,利率高达 50—75%。1602—1782 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 23 200 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 36 倍^[14](第 355 页)。这些巨额利润,是在其本国和欧洲市场内不可能得到的,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在与亚洲贸易中,荷兰也拿不出许多适合东方需要的商品,与葡萄牙一样主要用白银支付。

英国是西欧另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主要是毛织工业,从 12 至 19 世纪羊毛纺织在工业中居首要地位,是英国的“主要财富”和“国家的支柱之一”^[15](P.10)。英国曾遭到黑死病的袭击,而在 15 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恢复,养羊业在 15—16 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得到空前发展,为毛纺织业提供充足的优质羊毛,其产品不断向欧洲大陆输出。英国人夸耀说:“用了我们的呢绒,把半个欧洲穿着起来了”;由于穿了“我们的制服”,“全欧洲几乎成了英国的雇员”^[15](P.187-188)。英国的都铎王朝(1485—1603)虽还是个封建王朝,因要依靠国内商人的支持以加强中央集权,故实行一系列有利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鼓励他们向海外发展,亨利七世(1485—1509 年在位)常常借款给商人,条件是在借款期间要扩大商务;与法国、西班牙、丹麦以及其它国家订立了一系列贸易条约,相互免除关税和最近几年所加给商业的种种限制,以便商业活动更加自由^[16](第 139 页)。输出的商品,除大宗呢绒外,还有铝、锡、皮革、谷物等。英国史家利普森(E·Lipson)说,市场扩大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5](P.4)。

与荷兰一样,英国也迅速投身于新形成的世界市场之中,组织了一系列远洋贸易公司,其中有专门经营亚洲商务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是英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公司”,“是许多公司中唯一开发国家资本与制造业的公司”^[16](P.67,69)。英国人久已垂涎于亚洲的财富。葡萄牙开通了大西洋—印度洋新航线路并控制这条航线,英国为避免与葡萄牙冲突,于 16 世纪下半叶多次试图寻求另一条通往东方的商道,都未取得成效,至多只收集了一些关于印度的经济信息。于是英国商人(主要是伦敦商人)决心组织起来打破葡萄牙的垄断,从大西洋—印度洋这条新航道闯入亚洲,1599 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0 年底得到都铎王朝女王伊丽莎白 I 的批准并授予种种特权,包括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从东方市场上夺取敌对商人利益的权力,等等,“女王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4](P.67)。

公司成立后从 1601 年开始,积极派遣船队循着葡萄牙开辟的航道东进,参与欧亚贸易活动,但受到葡萄牙与荷兰的挑战,与之分别在南亚和东南亚进行激烈的斗争。印度是葡萄牙东方帝国的基地,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608 年到达印度西海岸北部港口苏拉特,获得当地的莫卧尔帝国皇帝尤汗吉尔(Jahangir)的同意,以苏拉特为基地,与南亚次大陆开展贸易,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与印度建立贸易关系,但立即遭到葡萄牙的反对。葡萄牙人成功地使莫卧尔帝国的皇帝废除颁给英国的特许状,并于 1611 年驱逐了英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威廉·霍金斯(William Howkins)。英葡两国在印度的矛盾日益激化,1612、1614、1620 年不断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葡萄牙人霸据印度时排斥在当地经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因而遭到他们的仇恨。于是英国人与葡萄牙的这些宿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失败了,1630 年开始投降,1654 年订立和约,完全承认英国在南亚的贸易权利^[4](P.99)。荷兰在亚洲的势力主要在东南亚,控制着这个地区的香料贸易,对于英国人来说,荷兰是比葡萄牙要强大的对手,要战胜他们绝非易事。英东印度公司渡过印度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在那里大量收购胡

椒;又从万丹(Bantam, 位爪哇岛西北端)派出一批代理商向东去香料群岛(即马鲁古群岛)中之安汶岛与班达岛等地收集丁香、肉桂、肉豆蔻等上等香料。这些都是荷兰不能容忍的,先以提高胡椒收购价格的手段对抗,接着于1619年利用其海军优势拦截英国船只,甚至于1623年在安汶岛屠杀那里的英国人。迫使英国退出荷兰所控制的东南亚地区,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南亚继续进行。1672—1674年间,荷兰人经常阻塞英东印度公司之苏拉特与孟买间的海上交通。在这个地区,英国人的力量占据优势,屡屡挫败荷兰的进攻,驱逐荷兰东印度公司设在印度一些代理店,最后到1782年夺占了荷兰在锡兰(斯里兰卡)的领地,1795年不仅把荷兰的势力赶出了印度,还夺取了其在好望角的殖民地。这样,大西洋—印度洋的航路及南亚都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区域,欧亚贸易中英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

16世纪开始形成的世界市场,亚欧贸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亚欧贸易在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天下,17世纪是荷兰人的天下,18世纪则是英国人的天下。无论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国,他们从对亚洲的贸易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英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头一二十年中,其利率从最初的95%,逐步上升为221%、234%、300%。高额的利率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最早的101人增加到954人。资本从创立时的30 133英镑,到1678年净资产增为125万英镑,70余年间增加了41倍^[16](P.227,228,230)。1698年英国又成立了新东印度公司,1709年新旧东印度公司合并为“东印度群岛英国商人联合贸易公司”(United of Merchant of England Trading of East Indies),或仍称“东印度公司”,资本达到316.3万英镑^[15](P.293-294),是100年前最初资本的105倍。如此高额利率和巨大的财富,是在贸易中对亚洲人民巧取豪夺获得的,质言之即殖民掠夺,这是亚欧贸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新航路扩大了东西方物资与金融交流。亚欧贸易虽开始很早,却从未像现在这样繁盛,东方的物资除传统的丝绸、瓷器、香料外,还有药材、棉花、黄金、咖啡、茶叶等等,更多的流向西方;西方的毛织品尤其是白银,大量流向东方。胡椒是欧洲人迫切需要的东方产品,16世纪后60年内,每年从亚洲进口600万荷兰磅,其中荷兰输入460万荷兰磅,英国输入140万荷兰磅。17世纪70年代,每年进口1 320万荷兰磅,其中荷兰输入920万荷兰磅,英国输入400荷兰磅^[8](第416-417页)。这意味着70年间亚洲胡椒生产增加一倍以上(输入中国的胡椒尚未计算在内)。咖啡和茶叶是比香料对欧洲更有吸引力的商品。17世纪末荷兰人将咖啡从阿拉伯引进爪哇种植^[13](P.197),最初未受重视,1711年只收获了100磅咖啡,而到172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欧洲销售了1 200万磅^[2](第168页),为东南亚开发出有价值的新资源。茶叶是亚洲的传统产品,始产于中国,6世纪传入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从中日商人手中收购,1610年首次运于欧洲,1635—1650年销于法国、英国、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3](P.297),成为比香料更受喜好的亚洲商品,“茶叶贸易开始了欧亚贸易史的一个新篇章”^[8](第383页)。英东印度公司于17世纪下半叶插手茶叶贸易,在万丹和马来半岛从中国海商购买,1689年直接到中国厦门装运^[13](P.198),打破了荷兰的垄断。1700年从中国西运的茶叶达100吨^[17](P.399)。据统计,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到伦敦的茶叶1760—1764年每年42,066担,1795—1799年上升到每年152 242担(每中国担合50公斤,公担合100公斤)^[18](第15页)。大量茶叶外销,无疑会促进中国的茶叶生产。欧洲的纺织品主要是呢绒,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断言:“英国的呢绒在中国将比黄金白银还要受到珍重。”^[15](第270页)东印度公司于1614年将价值1.4万英镑的呢绒运到东方来换取西方所需商品,结果销不出去,成了“死商品”(dead Commodity)^[15](P.277-278),不得不仍用白银支付。18世纪初,英国向东方输出31.3万英镑,18世纪中期输出81.5万英镑,末期为62万英镑^[15](P.314)。亚洲的棉花是西运的新产品,18世纪初,英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收购运回本国加工为布后,再返销亚洲,大获其利,并因此逐渐改变其现金支出的状况。1701年英国从亚洲输出棉花198.5868万英镑,向亚洲输入棉织品价值2.3253万英镑;其后渐增,1801年从亚洲输出棉花价值5600.4305万英镑,向亚洲输入棉织品价值705.0809万英镑^[15](P.97),100年内从亚洲输出的棉花增加28倍,向亚洲输入的棉织品价值增涨303倍。这些数字既反映亚洲的棉花促进了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也显示出亚洲棉花生产因而更加发展。16—18世纪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形成,是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开始,在扩大的亚欧贸易中,亚洲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CHAUNU, Pierre. 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Late Middle Age [M].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ress, 1979.
- [2]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3] 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4] Ramkrishna Mukherj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 [5] N.J.G Pound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M]. New York, 1974.
- [6] 契波拉. 欧洲经济史(中古篇) [M]. 台北, 1984.
- [7]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第 1 卷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8] 卡洛·M·奇波拉. 欧洲经济史: 第 2 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9] Wilhelm Abel. Agricultural Fluction in Europ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wusentieth Centuries [M]. London, 1980.
- [10] 布罗代尔.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 2 卷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 [11] 查·爱·诺埃尔. 葡萄牙史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4.
- [12] Clifford Thorpe Smith.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 [M]. London, 1978.
- [13]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IV [M]. New York: Cambn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4] 萨努西·巴尼. 印度尼西亚史: 上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 [15] 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M]. London: Adam and Chales Black, 1956.
- [16] Frederick. C. Diet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2.
- [17]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 IV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8] 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Z].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责任编辑 桂 莉)

On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West Europe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8th Century

XUE Guo-zho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UE Guo-zhong (1929-),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15th—16th century world history.

Abstract: After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 the world market had been shaping up gradually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d been deepened day by day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he opening of the European-Asian channel running through the Atlantic ocean and India ocean enlarged the extend of exchange of material and finance between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 and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and Asia.

Key words: The channel through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he India ocea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pice trade